

(英) 罗伯特·哈里斯 著
杰里米·帕克斯曼

SHA REN MO FA

杀人魔法

——毒气战和细菌战秘史

群众出版社

杀人魔法

——毒气战和细菌战秘史

〔英〕 罗伯特·哈里斯

杰里米·帕克斯曼 著

路明军 译 苏沃涛 校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A HIGHER FORM OF KILLING

The Secret Story of
Gas and Germ Warfare

本书根据伦敦 Chatto & Windus Ltd 1982年版译出

杀人魔法

〔英〕罗伯特·哈里斯

杰里米·帕克斯曼 著

路明军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00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076—8/K·2 定价，1.95元

印数，00001—16000册

内 容 提 要

一位叛逃国外的作家被人用雨伞在腿上扎了一下，两天之后突然暴死。另一名叛逃者在自己家门前被人用管子喷了一点东西，当即毙命。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就是本书中所描写的生化武器。本书以丰富真实的史料描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毒气战和细菌战的历史，揭露了美、英、苏各国在生化战方面大搞军备竞赛的真实内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目 录

致 谢	(1)
引 言	(3)
第一章 “谈虎色变”	(7)
第二章 毒蛇和鲜花	(50)
第三章 希特勒的秘密武器	(69)
第四章 殃及子孙	(88)
第五章 引而未发的战争	(134)
第六章 新敌人	(170)
△第七章 病菌的研究工作	(184)
第八章 化学武器的一再兴起	(212)
第九章 间谍的工具	(241)
第十章 从裁军到重整军备	(264)
跋	(291)

致 谢

本书取材于我们为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万花筒》制作的电视片。我们感谢《万花筒》编辑罗杰·博尔顿，感谢他当时给予我们的鼓励和建议以及他和广播公司其他人对我们一直表现出的谅解精神。

感谢对此书的实际研究工作给予了帮助的人。他们为数太多，不可能在此一一列出。除了篇幅有限外，其中许多人曾坚持只有我们答应不披露他们的姓名，他们才能畅所欲言。

然而，在我们能够提及的人中，我们应该感谢伦敦档案局、帝国军事博物馆、剑桥的丘吉尔学院、美国陆军公共事务部、埃奇伍德兵工厂的有关工作人员以及所有提供文件和提出建议的人。基督教科学派教会也向我们提供了他们发现的反化学战运动的文件。我们感谢其他向我们提出建议、提供资料的人，感谢A·杨格将军、J·埃里克森教授、T·H·福克斯将军、D·欧文、L·斯坦普、空军元帅C·哈特利爵士、H·巴克罗夫特教授和P·哈利斯教授。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讲师N·辛斯和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讲师A·罗伯兹都热心地为出版者阅读了部分打字稿并提出过意见。

S·马隆在华盛顿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我们还要感谢查托和温杜斯出版公司的J·刘易斯，因为如果当时没有他的热情鼓励，这本书本来是根本写不成的。还要感谢E·伯克，因为她使我们这本破损的手稿得以付印。

从许多帮助过我们的人中特别感谢某几个人固然容易引起反感，但我们还是要特别感谢两个人。一位是波顿研究所所长R·沃森博士，他在不违反机密条例以及在书不一定会得到“报界好评”的情况下给了我们极为重要的帮助。经他准许，我们还荣幸地得到了波顿研究所情报官A·斯彭斯的帮助和建议。

我们还要十分感谢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的J·P·鲁宾逊。他花费了许多时间，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建议，他审阅了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凡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人员都会得益于J·P·鲁宾逊在其化学、生物战问题的六卷巨著的头两卷中所收集到的资料，这六卷著作已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我们在这本书中也引用了其中的材料以及其他人对这问题过去作过研究的资料，我们将在本书末的注释中对此表示谢意。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难免在事实和判断方面仍然有错。如有错误，一切由作者负责。

罗伯特·哈里斯写了本书第一至五章；杰里米·帕克斯曼则写了本书第六至十章。

引 言

某个夏夜，我们正站在伦敦的一个大火车站的月台上，一群年轻的士兵拥挤着向唯一的一节空车厢走去。他们边走边说笑，手里拎着几瓶啤酒，准备在英国北部的家乡度过一段假期。因为没有别的空车厢可寻，我们只好和他们挤在一个车厢里。

他们神秘地透露说，他们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NBC训练后回家休息的。他们解释说，NBC就是“核、生物与化学”三个词的缩写。在执行一切规定任务时，他们得持续数小时地穿着特殊的防护服，戴着橡皮手套和防毒面具进行训练。他们打开随身带的啤酒狂饮，庆幸终于离开了那个地狱般的核战训练场。然而生物和化学战的可怕景象似乎还萦迴在他们的脑中。其中一个士兵说，这可真“肮脏”。

那种可怕的景象一直迴旋在我们脑际，直至写完这本书。化学和生物战——或一般人常说的令人无比恐惧的毒气和细菌战——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细菌和毒气都是非人道的杀人武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如同那年轻士兵所说——它们是很“肮脏”的，其效力在于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击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细菌和毒气都是看不见的。它们伤害人体的器官。人们可能

没看清杀人的子弹或炸弹就被击毙，但那种外来的有形威胁多少好理解一些，而看不见的武器那就可怕了。人一沾染上，就会患恶性肿瘤、瘫痪或窒息而死。

毒气和细菌武器亵渎了人类文明。有人不研究防治疾病，却在精心地培养病菌；有些医生竟用他们所掌握的人体功能的知识来发明破坏这些功能的方法；有些农学家有意识地诱发真菌，研制毁坏庄稼的药物。本来为了满足我们的祖母们想穿鲜艳衣服的愿望而发明的氯气，却被人用来毒害我们的祖父们。现代造成神经错乱的毒气本来是为了帮助人类杀死甲虫和寄生虫而研制出来的农药，现在，军事家掌握了它，却把它变成杀人剂。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化学生物战已成为“公共卫生的大敌”。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施放毒气以来，人们就试图对限制发展这种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结果都失败了。尽管外交家和裁军专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毒气和细菌战在世界军备中仍继续显示着令人胆寒的威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为什么建立一个无生化武器世界的尝试都归于失败？这正是本书所涉及的问题之一。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披露隐藏在铁幕之后的毒气和细菌战的秘密。据了解，生化武器的发展史远比核武器的发展史更具机密性。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由于使用这种武器存在着违反道义的可疑性，各国政府总是有意对人民只字不提他们准备用毒气和细菌发动一场战争的计划的性质和情况。只是在近几年内人们才获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关使用毒气情况的文件。但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详细情况的文件绝大部分仍被严密封锁着，可能要到

下个世纪才会公布于世了。我们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曾向英国国防部提交了一份战时文件目录，希望这些文件能解密。国防部和内阁的回答一如既往：这些材料——现在已有40年之久了——仍然“过于敏感”，还不宜公开。可能是由于受这种顽固的保密观念的羁绊，到现在还没有人写出化学生物战的发展史。有一些人曾在西方军事规划部门中最保密的领域工作了大半生，我们曾经和他们交谈过，了解了一些情况；又从别处得到了一些曾是保密的资料。通过这些材料，我们试图驱散笼罩在化学、生物武器之上的神秘烟雾。与此同时，我们还想在本书中说明70年前研制的武器使当代士兵仍然为之谈虎色变的道理。

这个世界只要有战争，军事家们
就绝不会对毒气置之不理。

毒气是一种杀人的更高形式，
——弗里茨·哈柏教授——毒气
战创始人——1919年接受诺
贝尔奖金时的演说

第 一 章

“谈虎色变”

1915年4月22日伊普雷气温宜人，阳光和煦。但傍晚时分，却微风骤起，从北面——德军防线背后——经过无人高地吹向伊普雷附近的朗格马克村，轻拂着驻守在该村阵地上协约国军官兵的脸颊。

这些来自北非法属殖民地的法国后备军和阿尔及利亚人对于战壕生活毫无经验。他们觉得徐徐吹来的清风对他们是个好兆头。果然在几秒钟后，向他们发射了一天炮火的德军突然停止了轰击，阵地上顿时万籁俱寂。

在离阵地前沿几百码的战壕里龟缩着德国陆军第23、26军团的四个师。他们天亮以来就在那儿一直等待着，却不敢出来活动，生怕露出了马脚。这时候，眼看时机似乎太晚，它却不期而至：风向变了，可以发动一次攻击。

傍晚5点钟，三支红色火箭划破长空，这是震耳欲聋的高射炮阵地发动攻击的信号。德军高射炮弹密集射向荒无人烟的伊普雷镇和附近的村庄。与此同时，掩蔽在朗格马克村的法军看见两股黄绿色的云团从敌军防线升起，乘风而飘，犹如波涛汹涌向前，逐渐合拢形成一股蓝白色的烟雾。在他们看不见之处德军用沙袋和钢筋混凝土构筑了一些特殊的掩护

炮位。那时，德军工兵们正在打开布满四英里长的战场上的6000个钢瓶。钢瓶中装有液态氯，压力一减，它就与空气接触，随即汽化，氯气便带着嘶啸声，形成一股浓密的云团。空气中一旦含有0.3/10000的氯气就足以使人咳嗽不止，而含有1/1000浓度的氯气即可使人毙命。160吨的氯气在离地面五英尺高的低空随着阵阵微风飘向盟军的战壕。

化学战开始了。

一分钟之内毒气波就冲过第一道防线，将好几万部队卷进苦辣的绿色烟云之中。由于这股烟云太浓，近在咫尺的士兵互相都看不见。几秒钟后，他们把手伸向空中乱抓，又揪住喉咙，拼命喘息。

氯气并不使人窒息：它刺激人的支气管和肺的内壁，使人中毒。气管和肺发炎就分泌出大量液体，堵住气管，使口内生泡，从而充满肺部。为了逃避氯气的这些效应，有些士兵竭力把嘴巴和鼻子埋到土里，有些士兵则惊慌失措地逃走，竭力想远远逃离烟云的人由于呼吸更急促而中毒更深。这股毒气笼罩了挣扎着的人们，使他们由于呼吸困难而憋得脸色发青。有的剧烈咳嗽，致使肺部破裂。后来英国的一份死亡报告说：当时这些人都“被淹死在自己的分泌物之中”。

那时，德国步兵都戴着用水淋湿的纱布和棉花粗制成的防毒面具，小心翼翼地尾随着氯气波向前涌去。他们见到了一个空前未有过的恐怖场面。盟国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胳膊伸得老长，象要逃避毒气的样子。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那些伤兵和快要死去的士兵趴在地上拼命挣扎，喘息，咳嗽，从肺里吐出大口大口黄黄的粘液，慢慢死去。凡是氯气接触过的金属全都生锈。钮扣、表壳、硬币都变成暗

绿色。步枪的金属部分全部锈坏，看上去好象在泥淖中浸泡了好几个月似的。德国人那天缴获的60门大炮上的大部分尾栓全部锈坏不能用了。

一些还能走动的法国士兵都逃走了。英国人突然发现在他们扇形战区内的通路和桥梁上挤满了撤退的士兵，他们大多数人只能指着自己的喉咙示意。到下午6点前，甚至在十英里外的地方，氯气云团仍然使人咳嗽，刺疼人的眼睛。快到7点，法军所剩无几的枪炮声也沉寂下来。

第一次大规模毒气袭击使协约国的指挥官们呆若木鸡，直到次日凌晨他们才开始估价。他们在这次灾难中蒙受的损失究竟有多大。德国人在西线打开了一个四英里宽的突破口，在一个下午之内就攻破了盟军曾坚守数月的防线。德军指挥官法伦海因也象自己的敌手一样为化学战的势如破竹的威力震惊不已。他原来只把毒气看作他发动袭击的一种试验性的辅助物，因而他当时没有足够的毒气储备来充分发挥优势。要不然，他本该直冲敌军防线，直捣英吉利海峡各港口：毒气本该为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然而，当夜幕降临伊普雷时，德军却筑壕固守。德国人估计，法伦海因的“试验”使协约国大约5000人死亡，1万人受伤。

36小时后，英国人和法国人仍然在拼命堵住他们防线上的缺口，但德国人再一次攻破。凌晨2点45分，即4月24日天亮前不久，加拿大军第八营上尉伯特伦发现，一股白绿色的烟雾从大约600码以外的德军阵地前升起。这股烟雾以每小时八英里的速度“沿着地面向我方战壕飘移，到达我前沿阵地时离地面不过七英尺”。浓密的氯气烟雾笼罩着加拿大士兵，他们仅有的防护物是撒上尿后塞进嘴里的手绢、短

袜和毛巾。在以后的几个小时内，他们接二连三地遭到毒气波的袭击。毒气波十分浓密，以致太阳也给遮挡住了。有一两次，他们透过烟雾，看见德军外貌象潜水员打扮，只见德军戴着前面装有一块玻璃眼镜的大兜帽。

后方也一样，惊慌失措，狼狈逃窜。在前沿战壕到诸支撑点的一小块地面上，伯特伦数过24具被虐杀的士兵的尸体。这些死者都曾拼命想逃离毒气区。伯特伦本人也呕吐、腹泻、呼吸困难，身体十分虚弱，“胸中有一种十分沉重的”感觉。

德军的毒气和大炮轰击杀死了盟国5000士兵。加拿大第15营中士格林德利是数百个被从战场送到简易卫生站中的一个，医生对于毒气中毒的病人束手无策。两天后格林德利喘息而死。给他治疗的军医称这种死亡是由于“空气饥饿”。他用蓝铅笔在死者的尸检报告中写道：

“死者的脸、颈和手明显变色。打开胸腔，两叶肺肿胀。移动时，肺中渗出大量淡黄色带泡沫的分泌液。显然这是一种高蛋白物质，因为轻轻敲打足以使它凝固成鸡蛋白似的东西。脑表面的血管大量充血，所有的小血管明显凸起。”

在遭到这次毒气袭击的幸存者中，有60%的人不得不被送回家。战争结束时，仍有一半人是残废。

象格林德利这样由于指挥员的失误而受害的人很多，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而这些指挥员实际上在数周前就得到过德国人正筹划阴谋的警告。当时有人封锁了这些事实，但现在我们知道了。4月13日——即第一次毒气袭击的一个多星期以前——一名法国巡逻兵抓获了一名戴着防毒面

具的德国士兵。这个士兵是德军第26兵团的一名24岁的列兵，名叫奥古斯特·耶格尔。他披露了德军准备使用毒气的计划，并描述了钢瓶的位置（这些钢瓶存在的事实已为空中侦察所证实）。耶格尔提供的情报被送到法军师长费里将军处，费里将军又把这个情报报告了英法最高统帅部，并建议：或者撤出处于威胁之中的部队，或者轰炸毒气阵地。他的警告和建议都没受到重视。英国官方有一份关于这次事件的报告——直到这次袭击发生几乎60年后，该文件仍列为“机密”级文件——文件上写道：

“几天以前我们就知道德军准备施放毒气的消息，但看来谁也没有意识到正在威胁着我们的巨大危险。人们认为，敌人的企图注定要失败，不管飘到我方阵地上的是什么毒气都可以不费力气地加以驱散。因此谁也没有感到丝毫不安……”

费里和耶格尔的预言都被证实了。可是他们两人谁也没得到好处。法国最高统帅部为费里泄露其无能而勃然大怒，从而解除了费里的职务。耶格尔的命运则更惨。在1930年费里发表的回忆录中，费里不慎道出耶格尔是提供情报的人。已是平民的耶格尔立即被逮捕。1932年他在莱比锡被判处10年徒刑。法庭断然认为，他泄露了德国的计划，导致打输了这场战争。他成为第一次毒气战的最后一名也许是命运最惨的受害者。

伊普雷的受害者被送到布洛涅附近地区，从而引起了科学家们极大的好奇心。德国人在使用什么毒气？能否想出对付毒气的防护措施？英国人当时在国内各大学 and 医院寻找出那些可能解答这些问题的专家。到了4月末，这座海滨小城

挤满了伤员和即将死去的士兵。一小批专家和学者看护着他们。

最大的一所医院当时设在勒图盖的一个战前著名的游艺场里。该建筑物曾是1914年8月结束的黄金时代的伟大象征之一。英国一位有权威的生物学家约瑟夫·巴克罗夫特曾写道：此刻，这些曾经迴荡着美妙声音的豪华房间，“简直被伤员挤得水泄不通”。还有一个设在防波堤尽头的原是娱乐宫的医院，“挤满了那么多伤员，几乎使人无法在其间移动。所有的床铺都睡满了伤员，地板上已无空隙。所有其它医院也一样拥挤不堪。有时同一张病床一天就抬走三个死者。”

人们在气愤的同时都会想到一个事实：使用毒气杀人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1899年海牙宣言曾促进拟定各种原则，当中规定了禁止使用几种“文明战争”以外的作战方法。各签署国（包括德国）都曾发誓“不使用任何能够放出窒息性和有毒气体的投射物”。

对于16年后那些中毒的士兵来说，这个爱德华时代绅士们所制定的协定到了1915年就成了一纸空文。这如同游艺场中的枝形吊灯和油画被洗劫一空一样。然而德国人却极其玩世不恭地宣称：他们没有使用“投射物”，而是施放钢瓶中的气体烟雾。他们拒不承认违反海牙协定这个事实。更有甚者，德国《科隆报》声称：“随着微风放出的缕缕烟云缓慢地飘向敌方。这不仅是国际法允许的，而且是一种格外温和的战争方法”。英国总司令约翰·费伦奇爵士闻之大怒。4月23日他给伦敦打电报要求采取报复手段。24日加拿大部队又一次遭到毒气袭击，这时英国防大臣基钦纳勋爵作了答